

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0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源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成果

20世纪

中国人物传记

与数据库建设研究 第2辑

姜义华
梁元生
主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0世纪中国人物传记与数据库建设研究”

20世纪

中国人物传记

与数据库建设研究 第2辑

姜义华
梁元生
主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人物传记与数据库建设研究. 第 2 辑 /
姜义华, 梁元生主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458-1089-9

I. ①2… II. ①姜… ②梁… III. ①人物—传
记—数据库—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①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0321 号

责任编辑 邓小娇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20 世纪中国人物传记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第 2 辑)

姜义华 梁元生 主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mm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00,000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8-1089-9/K.187
定 价 48.00 元

大数据催生史学大变革(代序)

姜义华

我们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迎来了信息革命,非常突兀地一下子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历史学也不例外。

一、大数据使历史资料利用产生革命性变革

众所周知,大数据具有速率(数据移动得快)、体量(数据规模庞大)、多样性(非结构化和结构化的信息)、价值密度(大量不相关信息及深度复杂分析)四大特征。在历史学领域,大数据成百倍、成千倍地扩大了历史资料的范围。尤其突出的是,除传统的文献与遗址、遗物外,人类所存留的所有纸质的、音像的和其他物质的、非物质的各种资料,几乎都可被用来协助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人们在大规模数据的基础上可以做到的事情,在以往小规模的数据基础上是无法完成的。

大数据的价值更在于它我们的生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量化的维度。过去不可计量、难以存储、不易分析和不方便共享的很多东西被数据化,并被迅速传输,这就使人们能够通过拥有大量的数据,包括许多不那么精确的数据,打开理解世界的一扇新的大门。大数据通过数据采集、数据储存、数据分析、数据管理为大范围、中时段、长时段定量分析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历史学研究与大规模基因检测相结合,有力推动了家族史、宗族史、移民史、民族史

研究,就是一个成功的实践。

大数据所提供的古今中外既有研究信息,无疑有助于人们较为系统、较为全面地了解相关问题已有的各种成果,了解它们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在一个高起点上开展创造性研究。这可以避免许多意义不大的重复劳动。

大数据使历史资料利用产生革命性变革,更集中地表现在大数据有助于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因为大数据可以较好地用数字模拟方式在一个大范围内展现历史场景,以及在一个中时段、乃至长时段历史过程。大数据信息系统还可以较方便地将历史活动中各种要素全面地、综合地、动态地展示出来,这样,它就可能为历史研究创造新的价值基准。

二、大数据有助于历史活动中大众主体的角色地位

长时间来,由于既有文献资料的限制,人们研究历史时,必然是以社会精英人物为主要对象。这就难以避免使这些社会精英成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唯物主义者一直重视人民大众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但由于资料稀缺,人民大众常常只是虚拟笼统的、抽象的、概念化的存在。大数据使草根大众日常的、琐碎的巨量历史资料可以便捷化地被利用,这就使历史活动中草根大众一个个鲜活起来,具体起来,成为真实的存在。

大数据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能够较方便地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地运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最新成果及研究手段,能够较有效地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实现真正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结合,使跨学科研究不仅成为了解历史客观实际的必要,而且成为真正的可能。这就使历史认识必定会超越社会精英狭窄的范围,而切实了解社会精英和草根大众复杂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正是大数据的巨量

档案资料和空前丰富的内容,推动了传统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并给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的研究,给民众心理、民众信仰、民众实际利益诉求的研究,提供了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坚实基础。

历史活动中大众主体地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精英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重要作用的否定。但大数据将提供非常有力的证据,说明社会精英们的所作所为如何离不开社会大众这个主体,历史进程如何最后仍决定于社会大众主体的取舍。大数据能将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在微观、中观及宏观层面上真正综合起来,这就更能揭示包括精英与大众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如何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共同创造历史的本来面貌。

三、大数据推动历史学从庙堂之学走向公众之学

现代化进程中,人的主体性不断增强,随之而来的便是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自己个人的历史,自己家庭、家族的历史,自己家乡和地方的历史,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历史的记忆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们文化的基础性诉求。公众史学因之应时勃兴,并愈来愈活跃。

伴随着信息化在全社会的普及,历史书写进入寻常百姓家,人们可以自由地书写自己的历史,还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上参与书写地方的、国家的及其他各种专门的历史,自由地对历史问题发表评论。这样,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都不再仅仅是历史学家们所专有的工作,公众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实际上,大数据已经刺激了大批非历史专业的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员参与到历史研究、历史书写队伍中来,他们没有受过历史研究的基本训练,但又各有自己专业之所长,常常可以发专业史家之所未发,当然,也会使历史记述与历史解读更加多元更加多样,乃至出现各种各样一般不应有

的严重讹误。

大数据使得千千万万社会成员可以很方便地对各种历史问题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所有与历史相关的著作及其他成果自由进行评论,并迅速扩散、传播,对真实历史、专家之学、庙堂之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大数据时代最大的转变就是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取而代之是关注各种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会引导人们只要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这就将颠覆千百年来人类的思维惯例,对人类的认知和与世界交流的方式提出全新的挑战。

其实,公众史学的勃兴,终究不能取代专家之学。大数据为文献收集、校勘、考订提供了很多方便,但它终究不能取代“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作半句空”聚精会神的深入研究和深邃思考。公众史学与专家之学应相得益彰。

四、面对大数据史学与史家的时代责任

今天,大数据使得史学表现形态及传播形态产生了革命性变化,它也使粗制滥造、鱼龙混杂、不负责任的许多所谓历史新诠释、历史新故事的影响力、动员力空前扩大。史学领域话语权的争夺,当今可以说比之以往任何时候都亦更加剧烈,更加严酷。

大数据时代史学与史家的职责没有降低,而是更为重大。大数据不是取消历史研究中所必须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更需要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无数纷繁复杂、彼此互相矛盾的历史资料中,要不迷失方向,能够准确地再现客观而实在的历史,对历史运动做出严肃认真的科学解释,从而帮助人们理性地对待历史和由历史演进而来的现实,我们仍然需要像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本人那样,认真辨析历史矛盾运动中的表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局部与整体,从各种矛

盾的陈述中清理出真实的事实,从形形色色被扭曲、被掩盖、被虚构的历史记述中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历史自身的真理。

大数据将量化研究广泛引入各种历史问题的研究,但是,任何量化的东西,都有其边界。尤其目前各种数据库,所选录的数据,都不仅有既有资料本身的局限,还有建立数据库时建立者自身标准的局限。使用数据库者,选择多少样本,选择什么类型的样本,更有极大的主观性。因此,不能将量化研究的意义无限夸大,定量研究必须与定性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研究成果方才可能有更多的科学含量。

当代史学与史家,要名副其实地承担起自己的时代责任,要善于运用大数据时代所提供的世界性知识和世界性视野,真正跨越学科藩篱,结合多学科人员组成各种研究团队,彼此密切结合,通过综合研究方法,使史学与史家的能力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并使公众史学水准迅速提高,坚决摒弃种种背弃历史真实、轻侮历史真实的错误行径。

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史家,必须始终不渝坚守的责任伦理就是:敬畏历史,追求信史。历史的中心是人、人群、人类,而人、人群、人类的活动从来就离不开自然环境,离不开宏大的生态系统。大数据给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研究人类史和自然史,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方便的平台,我们要珍惜,要更加努力,坚持追求信史。信史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生命价值之所在。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资深特聘教授)

目 录

大数据催生史学大变革(代序)	姜义华	1
合作书写香港人物传记		
——以当代中心的“商业·文化·社区:香港企业家传记系列”为例	梁元生	1
世界船王与海上教育:从“海上学府”到“宇宙学府”	郑会欣	7
世纪利丰		
——寻找家族企业延续之道	郑宏泰	32
李耀祥(1896—1976)与香港近现代社会 ...	梁元生 卜永坚	62
家族与家族企业:以简氏家族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个案	庄仁杰	90
台湾近代史研究所《近现代人物资讯整合系统》的现况		
与展望	黄克武	106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	叶子菁	124
蔡锷、蒋百里、杨杰与三大国防论著		
——从《军事常识》《国防论》到《国防新论》	余子道	129
黎照寰致宋庆龄三封书信译介	孙娴静	156
“从‘自国自心’发出来”		
——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形成与旨要	王 锐	170
沪港经济合作的开拓者——张承宗	张 云	209

“蜀中多奇士”:论史旧题知新意

——萧印唐先生《论治国史之要籍》读后

..... 傅德华 张晓川 229

华人基督徒企业家的人生轨迹与历史定位

——以宋棐卿传记为中心 侯 杰 王晓蕾 236

烽火岁月之乡愁与国恨:一位旅沪宁波商人日记的整理

与研究 周东华 257

近代上海企业家刘鸿生与他的事业 蒋宝麟 274

略论近代外侨对上海城市的认同 熊月之 300

香山近代人物传记的价值与意义 胡 波 323

民国人物传记资料的形成、结构与特点 邓小娇 340

从全文检索到数据分析:关于建置“妇女期刊资料库”的

一些思考 连玲玲 358

《现代妇女》杂志有关中国近代人物传记的研究 于翠艳 367

上海美专(1913—1937)的境外艺术家

——兼探上海美专的境外文化影响 郑 洁 386

后记 434

合作书写香港人物传记

——以当代中心的“商业·文化·社区：
香港企业家传记系列”为例

梁元生

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三项重要工作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于1967年成立,除了文物馆的重点在于搜集文物和研究艺术外,开头二十余年研究所的研究方向较为着重于传统文化和中国文献与历史方面,后来亦顾及近现代和翻译研究,先后设立了考古艺术、中国古籍、中国语文、翻译等多个研究中心,及至1989年之后,研究所在所长陈方正教授带领下,创办《二十一世纪》杂志,鼓励知识分子对当前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反思,又设立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对现代中国文化和其他学术问题作深入的研究,至今有二十余年矣!

总而言之,近年来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持续进行的工作,大致可归纳为下列几个方面:

(1)思考当代中国社会:渊源、困境、出路……联络及鼓励当代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者,对中国当前问题作出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并以《二十一世纪》为平台,发表他们的看法。

(2)修正官方史学:鼓励以档案和史料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多元史观,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努力还原历史的真相。由

金观涛、刘青峰带领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十卷,可以作为中心在这方面作出的尝试。《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中不少文章,也朝着此一方向努力。

(3)思想和人物数据库的建设:主要是由前中心主任金观涛教授建立的一个数据库,搜罗1830—1930年代一些重要思想家的著作,进行专业和系统性的搜查和展示,把思想和概念作量化分析,成为研究思想史和观念史的一项重要工具。

至今上述几个方面的工作,大部分已经有了成果,中心在后续和优化方面也投入了很多资源,例如“思想史专业数据库”的增大范围和普及应用。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虽然有几卷因事延误,大体上整个项目也已告一段落。这些年来,中心在思考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厘定新计划时,除了整固和优化原有的成果,也尝试把部分研究重点重新放在“本土”(即香港和岭南)与内地的关系上,也希望把研究重点由着重于“思想”和“观念”,重新集中于“人”或“人物”上。故此在经过数年的蕴酿和思考后,逐渐推出“香港家族与百年中国”,以及“港澳人物与中国变革”等研究课题。下面要介绍的是筹备经年,并于今年推出的一个人物传记丛书系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后续出版计划。

二、合作书写人物传记:中心的一项新计划 ——“商业、文化、社区:香港企业家传记系列”

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十卷)之后,中心将要在本年度推出一项较大型的新计划,即是撰写一套近现代香港/港澳名人丛书,构想中的第一期包括下列七大册:

1. 莫仕尧、莫干生家族(负责人:莫华钊,丁新豹)
2. 利荣森(利干,林业强,郑宏泰)
3. 利国伟(郑宏泰)

4. 李耀祥(李韶,梁元生,卜永坚)
5. 董浩云家族(郑会欣)
6. 郭泉、郭乐家族(郭志梁,梁元生)
7. 简照南家族(庄仁杰)

本来我们最初的意图是集中于香港企业家和商人,以他们来代表近百年的香港文化,其后我们注意到我们所选择作传的人物,远远超过企业家和商人的身份,他们对于香港社会的发展,扮演着多元而重要的角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留,对社会的革新和进步,对发展教育和文化,都有很大的贡献。正由于此一原因,这套传记撰写时的重点,便会放在计划主题标出的三个方面:他们在企业或商业(Commerce)上的地位、他们在保存中华文化或引入西方文化(Culture)上的贡献、以及他们在华人社区(Community),甚至参与政府管治时所扮演和担任的角色。

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企图透过“内外”合作而求得完整与平衡,即是透过家族成员和研究学者的共同合作,来完成这一套人物传记。家族可以提供主观和亲密的意见,也可以提供私藏的文献、信函、图片等,使传记有更为充实的史料基础,而学者的训练应该较为客观,甚至带着较多的批判性眼光,故此能够避免传记流为歌功颂德的献媚史学,但由于家族所提供的更多和少为人知的数据与角度,合作书写的结果会使得传记有更多的参考价值。

上面所列的第一期的七本传记中,大部分都得到家族成员的参与。其中莫华钊先生,就在今次会中。莫先生是莫庆尧基金会的负责人,是十九世纪香港著名买办莫仕尧家族的后人,他自己是个专业会计师,也是个资深的中国古代文物收藏家。现在他也是中文大学文物馆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他对莫氏家族的历史很感兴趣,前后也写过几篇关于莫家先祖的文章。由他和著名香港史专家丁新豹合作,相信这本传记必然文献充足,史料翔实,而且能够做到“内外”平衡。我个人期望莫家的传记,大可不限于一册,甚

至可以二册或更多,因为莫家是香港最早的大家族之一,至今超过五代,而其影响社会之范围也很广泛,包括商、学、医,乃至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皆可见其家族成员所作的贡献。

至于撰写利荣森先生的传记,一直以来是我和中文大学同仁的心愿。许多中大人都对这位北山堂主人极表敬佩,因他在收藏中国古董文物方面,冠绝群伦,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贡献极大。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中大部分的馆藏,也都是来自北山堂的捐献。这部传记由前文物馆馆长林业强执笔,是最理想的选择。由于利荣森先生是利希慎家族成员,也曾主管利氏的商业王国,我们得到先后写过利希慎及利铭泽两本传记的学者郑宏泰也来参与这个工作,并且得到利干先生的支持,相信也同样会取得“合作书写”及“内外兼顾”的效果。另一本是关于利国伟的传记,也是利氏家族与学者郑宏泰的合作计划。

下一本是李耀祥先生的传记,由李耀祥先生的儿子李韶博士和梁元生及卜永坚两位学者合作撰写。李耀祥的一生传奇故事,从参加反清革命开始,到留港接受英式教育,再而留学美国,回港从商,兴办“李耀记”及各种工程服务,到晋身华社及港府的统治阶层,成为东华三院的主席和顾问,是一位经历香港社会变迁及发挥重大改革能量的企业家和生意人,却为历史所忽略。李韶博士除了提供研究经费,也把祖居开放,提供家族所藏的文献和照片,并且接受访问,但对学者的立论和意见,并不干预,全由学者主导,这是另一个合作书写的模式。

董浩云传记也是用这个模式去进行和完成的。即家族与学者共同合作,做到“内”和“外”两方面的平衡。董建华、董建成和董建平的家族,提供大量的档案和文献数据,包括董浩云先生的日记原稿,给学者郑会欣教授极大的协助和使用时的方便。至于永安公司的郭泉和郭乐兄弟,或其他家族成员的事迹,也是第一期人物传记计划中的一个部分。梁元生和永安公司的郭志梁主席已经取

得联系,并对永安公司的档案作出初步的检视和调查,只是家族历史方面仍有待时日始得进行。

最后一本传记是南洋兄弟公司的创业者简照南,他的生意和家族网络范围较大,超过省港澳地区,北面发展到上海、天津,南面发展到东南亚各地。庄仁杰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研究兴趣及重点放在家族史及商业史方面,但家族成员的投入尚有待加强,才能显出“合作书写”和“内外兼顾”的特色。

三、从人物传记谈到数据库的建设

刚才姜义华教授提醒我们:现今的时代是个“大数据时代”,由于计算机和网络科技的进步,使得亿万种不同的信息和数据,在很短速的时间内可以手到拿来,作为参考之用。在学术研究圈中,数据发掘、数据分析、数字管理,以及各种数据库的建立和联系,也成为潮流与学问。在中国历史学界,由于档案数据丰富,于是也促生了无数的数据库,方便学者搜索数据和研究之用,也有些数据库只是应运而生,随便地把档案或数据拼凑起来,或只是利用复印技术,并非经过认真检查史料、验证史料的程序,故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提供的数据,图个方便。然而,数据库的确在现代学术圈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也带出一些新研究的可能性,例如当代中心开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对于“观念史”的开拓和发展,应该有一定的作用。当然“大数据时代”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年轻学者对数据库的依赖,不再皓首穷经,阅读正典,对历史的背景和氛围没有一个较为通盘和全面的认识,以及过于利用搜索引擎的帮助,而没有注意各种资料内在的联系性和逻辑性。

无论如何,数据库的建立是学术研究者“在‘大数据时代’”必然需要考虑的工作。每个学者在从事研究工作过程中,一定在不断地搜集数据和阅读数据,尤其是研究一些原创性的课题,需要寻找

一些鲜为人知,又少为人用的数据时,更值得我们去把数据作系统性的分类和保存,这就成了数据库的雏型。以人物数据库为例,现在常见的大多数是“人名辞典”和“人物表”的网上版形式,换言之,是活动版和电子版的 Who's Who,方便翻查和更改。或者可以利用计算机帮助,把人物的不同字号、交游网络,甚至姻亲关系,随时检索出来,进行研究。

当代中心的香港人物传记计划,主要是要出版专书。但在整个撰写人物传记的过程中,我们也极其关心资料的收集和保存。我们认为收集得来的大量原始资料,只有一部分会用在书中,其余的大部分数据,包括家谱、族谱、信札、函稿、单据、相片,和相关数据,应如何保留,及如何为后来的学者使用?我最初的构想是成立个别人物的电子数据库,日后再进一步去建立其中的联系和检索功能。

我相信当代中心这项人物传记的计划在完成第一期七本传记之后,必定收集到相关人物的大量原始及二手数据,这些数据除了和传主有紧密的关联,也对当时有关人等及社会情况有重要的披露,是研究近现代香港历史的珍贵素材。因此之故,如何把这些数据作有系统地保存,甚至建成有连接和搜索功能的数据库,以供他人使用,是我们推出这项传记计划时想到的相关工作。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历史系讲座教授)

世界船王与海上教育： 从“海上学府”到“宇宙学府”

郑会欣

教育为本

董浩云(C. Y. Tung, 1912—1982)不仅是闻名遐迩的世界船王,他的船队可以称得上是富可敌国,最高峰时曾拥有 150 多艘、1,100 多万吨各种类型的大型船舶;而他为世人所熟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源于他坚持不懈地倡导海上教育,并身体力行,不计成本,亲自实践这一伟大壮举。

董浩云倡导海上教育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举动,这同他个人的成长背景以及时代发展的要求密切相关,更是他一生追求和奋斗的目标。董浩云年幼时因家境并不宽裕,年仅 16 岁便步入社会,未曾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他从实践中深知知识的重要,因此他踏入社会后特别热爱学习,不论什么时间,一有空闲便抓紧时间读书阅报,了解国际间的大事。他的外语水平相当高,尤其是有关远洋航运的专业知识更加渊博,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平时积累时间,自学而成。董浩云从个人的经验中更是坚信“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应该从实践中学习真知,他不仅要求部属不断学习先进的知识,而且还为他们创造学习的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进入六十年代,随着全球经济的